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China

Translation in

中国翻译通史

马祖毅 等著



现当代
部分

C China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第四卷

A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1949-1979

现代史学

C
第四卷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全一卷,现当代部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马祖毅 等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ISBN 7-5351-4377-6

I. 中… II. 马… III. 翻译-语言学史-中国-古代、现当代
IV.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565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4150 千字

(430034·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25 插页 189.75 印张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351-4377-6/H·139

(全套共五卷)定价:48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篇	1
第1章 通史、断代史、历史考证	3
第2章 中外关系	12
第3章 人物品评	21
第4章 学术思想研究	35
第5章 文学、艺术、语言	42
第6章 科学技术	53
第7章 经济、社会生活、宗教	60
第8章 “西域学”、藏学、蒙学	69
第9章 地志、民族志	85
第10章 印象记、游记、报道	93
国人的外译汉籍篇	113
国内各民族的语文翻译篇	173
第1章 汉文或外文著作文献译成少数民族语文的情况	175
第2章 少数民族典籍及民间文学作品的汉译	183
第3章 少数民族翻译家	238

国内现当代研究翻译理论的概况篇	279
第1章 关于译名研究	281
第2章 关于直译与意译	290
第3章 关于“信达雅”	299
第4章 关于形似、意似、神似与化境	307
第5章 关于翻译美学	313
第6章 关于翻译风格	326
第7章 关于翻译批评	340
第8章 关于文学翻译	351
第9章 关于译诗	367
第10章 关于口译	381
第11章 关于建立翻译学	391
后记	407
主要参考书目	409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篇



第 1 章

通史、断代史、历史考证

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篇·第1章 通史、断代史、历史考证

欧洲人早期研究中国文化,其材料来源,主要是传教士提供的。这些传教士,对于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创造一种研究中国学术的风气和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有巨大的功绩,并从中产生了早期欧洲的汉学家。自从欧洲传教士在亚洲开展传教活动以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历史,引起了欧洲人士的注意,遂有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的著述。首先是门多萨于 1585 年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本的《中华大帝国史》,继之曾德昭于 1637 年返欧后撰写了《大中国志》,卫匡国于 1658 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拉丁文本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冯秉正在 1777—1783 年出版了 12 卷本《中国通史》,最受启蒙运动人士注意的是安塔纳西·基尔契于 1667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翻译出版了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5)是西班牙奥古斯丁教会的传教士。他的《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后,在 5 年之内就在欧洲各地出版了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译本。当时投身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文学家卡里热(1540—1609)在读了此书译本后,在 1587 年致法国作家法米凯莱·戴·蒙太涅(1533—1592)的一封信中说:

和中国这个令人赞赏的王国比较起来,我们法国人(按:因为他长期居住在法国)太渺小了。我们法国人之间非但不能和睦共处,而且互相厮杀(按:法国正由于“圣战”而分裂),中国人安逸地生活,在法律上井井有条。单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会指斥我们,就会使基督羞愧难容。(转引自严绍澍《日本中国学史》)

米凯莱·蒙太涅在校阅《中华大帝国史》法文版时,在书中加了批语说:

尽管我们没有接触过中国,不了解它。但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四卷

杰出方面都超越了我们。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中国由国王派出钦差大臣巡视各地,惩办地方上的腐败官员,褒赏清廉秉正者。(转引自同上书)

《中华大帝国史》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记中国的事情及中国的历史;第二部分包括3个传教士的中国行纪及环球行纪。这部根据前人资料编写的史书,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中国社会被描绘得十分美好,没有贫穷,没有乞丐,作者让这个遥远国度顺应他理想的样子呈现在读者面前。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掺杂了不少夸大之辞和明显的传说,但由于作者对中国社会、文化、民俗生活等诸多方面作了特别有趣和现已罕见的记述,因此仍不失为一部珍贵的文献。

曾德昭是葡萄牙人,耶稣会传教士,1613年来到中国南京,1658年死于澳门。45年间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传教,曾为南明永历帝、后举行弥撒,是继利玛窦之后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欧洲人之一。1637年他曾短期返欧,期间撰写了《大中国志》。该书披露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史料,即明朝曾主张借“洋枪”抵御女真。天启年间,一个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使者向明朝官员建议,从澳门汇集一支军队携洋枪洋炮来北京协助明朝军队抵抗女真。这一建议上奏后皇帝欣然接受,于是一支400人的西式军队向北进发,可是在到达江西时却受阻了。原因是广东一批商人担心葡人就此可能得到进入中国内地贸易的特许,从而影响他们的财路。为了阻止这一事件,他们用巨资进贿官员,让原先推荐葡人助战的官员再次上奏,说已无需葡人。尽管这些官员受到皇帝的斥责,但葡人的远征也就此作罢了。

属于通史性质的译著,有1932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俄国沙发诺夫著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李俚人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驹井和爱著的《中国历代社会研究》(杨炼译),1937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佐野袈裟美著的《中国历史教程》(刘惠之、刘希宁译),1949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的费若明译的《唯物史观中国史》(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拉铁摩尔夫妇著的《中国简明史》(陈芳芝等译)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推出的法国谢和耐著的《中国社会史》(耿昇译)等。

历史考证方面的译著则有日本园田一龟著的《清乾隆东巡道里考》(茅乃文译并自刊,1923),日本箭内互著的《辽金纪军及金代兵制考》(陈捷、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32),法国鄂卢梭著的《秦代初平南越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4),日本梅原末治著的《中国青铜器时代考》(胡厚宣译,商务印书馆,1936),日本仁井田升著的《唐令拾遗》(栗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唐令拾遗》共辑唐令33篇,内容涵盖唐代社会的各方面。

这里附带提一提,关于中国法律的译著,尚有日本浅井虎夫的《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2册(陈重民译,中华书局,1961),美国布迪·C·莫里斯的《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美国金勇义的《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陈国平等译,198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收入“中国学汉译名著丛书”)。该

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第1章 通史、断代史、历史考证

书原名是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s of China and West。书中将中国传统法律置于世界法律之林,把法的观念与哲学思想紧密相联,对中国传统的法观念进行剖析,并对中国与西方法观点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许多人认为在东周之前只是大而化之的几段神话。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就是让人们走出疑古、迷惘,使夏商周的历史有一个确定、完整的框架,科学、历史地将中华民族这一段文明史呈现出来。工艺美术出版社于1999年11月出版的毛小雨译,美国张光直编的《商代文明》一书,运用考古学、人类学、天文学的材料与研究方法,首次详实地再现了商代的文明史。书中涉及商代青铜器、金制品、陶器、甲骨文字及商代社会和自然环境诸方面的研究,颇有价值。东方出版社则出版了陈博译,美国华裔学者著的《中国的传统》一书。该书作者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以笔代耕,以口代织”,潜心研究,撰写出这本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的专著,着重讨论了从黄帝起到周朝建立期间1500年中国民族伦理的起源和实况,并着重叙述了早期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神话、宗教、祖先崇拜、家庭观念等等。对尧、舜、禹、文、武和周公的生平、信仰、人际交往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从1914年到1925年在中国工作期间,以其独特的努力,在地质勘探和考古学领域中做出重大发现。他对仰韶文化的系统发掘和研究,为奠定现代中国考古学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地质调查所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一书。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谢弗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该书原名《撒马尔罕的金桃》,译者吴玉贵将其改译成现名,这样就使意思更加明显,一眼就可看出此书所要研究的主题。书中所展示的一千几百年前的奇异场景,读起来令人嗟叹不已。然而猎奇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在物质客体之中找寻历史的踪迹,乃是本书的任务。不妨引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明:

一只西里伯斯的白鸚,一条撒马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书,一剂占城的烈性药等等——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所有这些都为盛唐文化的美酒增添了新的风味,而它们自身也混合在了这美酒之中,成了供酒君子品尝的佳酿中的一剂甘醇的配料。

早在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过日本稻叶君山著的《清朝全史》(但焘译),199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又推出魏斐德著的《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等译,阎步克等校)。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有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林利著的《太平天国外记》(孟宪承译),1944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韩山文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译),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英国呤喇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2册,王维周译)等。

王元化先生在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时回忆说:“这本书是50年代末由先父

of History /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四卷

和我共同翻译的。他译了前8章,我译了第9至第26章。……呤喇也是倾心于李秀成的,还帮助忠王作过战,自称‘本书是遵照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嘱托而写的’。扉页上印有题词:‘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作为对他的纪念’。”王氏又说:

过去我只知道曾国藩军中有“挖目凌迟”之刑,但它究竟残暴到什么地步是不清楚的。呤喇这本书曾引1863年6月13日《华北先驱报》刊载“一个目睹见证人”所写的《太平军俘虏的遭遇》一文:

……太仓被占的次日,上午11时光景,有7名俘虏被押送到卫康新附近清军营地。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受到了最精细的残忍酷刑。他们身体各部分全被刺入箭镞,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他们从这些俘虏身上割下了,或者不如说是砍下了一片片肉,因为他们的行刑工具太钝了。这些肉挂着一点点薄皮,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在数小时之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落日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像个恶魔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面前,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下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这些都是赤裸裸的事实。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由其他见证人予以充分的证明。

关于义和团运动,则有英国普南特·威尔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陈冷汰、陈诒先译,中华书局,1928),德国瓦德西著的《拳乱笔记》(王光祈译,中华书局,1928)等。商务印书馆曾于1975年出版过俄国布克斯盖夫登男爵著的《1860年〈北京条约〉》(王濯等译)一书。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间是1900年8月14日。在此之前,外国使馆曾被围攻50多天。当时在被围的英国使馆内参加战斗的普南特·威尔记下了每一天被围的情况,后以《庚子使馆被围记》书名出版。1900年6月24日,威尔记云:

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众公使大惊。……予前已述过,英使馆之东南二面为别使馆所掩护,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线之人失守而退,敌始能至耳。西边因有上驷院之保护,亦不必十分设防。故敌人能直接来攻者,唯余二处:一为窄狭之北方;一为西南角,其间有中国矮小房子接于使馆之墙。彼中国奇异之攻击,只能于此二处发展。初自西南角来攻,今则转其锋于北面,放火烧翰林院。

围攻者火烧翰林院,从北面攻击英国使馆。而翰林院当时正储存着《四库全书》底本和《永乐大典》,因此在这一炬中书籍便化为灰烬。纵火焚烧翰林院是在6月23

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第1章 通史、断代史、历史考证

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是在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可见《四库全书》底本和《永乐大典》被焚,与八国联军并无直接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薛君度著、杨慎之译的《黄兴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史扶邻著、丘权政和符致兴译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谢纘泰著、江煦棠和马颂明译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省政协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以及广州花城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于1981年联合出版的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并注释的《三十二年之梦》等。

工人出版社于2000年初在“海外中国报告”丛书中推出两本有关“中国史类”的著作:一是法国伯来拉·克路士著的《南明行纪》(李申译)。这是西方人撰写的明代南中国亲历的纪实之作。作者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上观察明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政治制度,书中对市井风物、民居城建、官场风习,都有详细的描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二是17世纪俄国外交官尼古拉·米列斯库著的《中国漫记》(柳风远等译)。这是一本全面介绍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况的著作。书中详叙了中国的礼仪等级、科考制度、人种风俗、地理风光等等,其中穿插了大量的历史掌故及当时的新闻事件。因其考察深入,取材广博,文字生动传神,为时人评为“是俄国文学中全面介绍当时对人们如此陌生的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幅才华卓绝的壁画。”该书原名《天下第一洲——亚细亚洲,位于此洲的中华帝国及其各省市》。

1974年,三联书店出版过苏联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集体翻译,内部发行。至于当代史,则有下列数种:时事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了美国戈尔斯坦著的《喇嘛国王的覆灭》(杜永彬译),该书详细叙述了1913—1951年西藏上层社会斗争的史实,材料翔实。作者在西藏考察了两年,访问了定居在印度的藏人和原先在西藏供职的英国外交官,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大量引用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和美国国家档案,剖析了西藏现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如达赖和班禅两大喇嘛失和、寺院集团和噶厦之间的冲突等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1月出版了美国莫里斯·梅斯纳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该书被誉为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之一,其特点是涉及面广,并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撰写中国现代史,用比较历史研究法来剖析、叙述我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视野开阔,立论独到,但也有偏颇之处。

对“文革”的研究,翻译出版的有美国威廉·A·约瑟夫著的《极左思潮与中国1955—1981》(夏军等译,东南大学,1989),美国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两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求实出版社两种译本,1989),美国华裔学者的阿妮达·陈著《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史继平等译,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等等。阿妮达·陈为自己的课题,在香港结识了一批来自大陆的红卫兵,跟他们建立了朋友式的联系,通过教他们学习英语,与之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每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四卷

次谈话大约持续2到3小时,平均每人都有8到10次谈话。然后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并翻译成英文。作者依照社会学的坐标分析方法,从中选取了4人,分别界定为“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反抗的积极分子”、“顺从的积极分子”和“讲求实用的积极分子”4种,追踪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文革”中的表现和思想,探究他们何以纷纷卷入动乱狂潮,从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和性格特征方面论证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必然性,立论严谨而富有说服力。

美国学者钱金保在《中国史学大师费正清》一文的开头说:“大凡从事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中国人恐怕一般都不会不知道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这个大名,由于政治原因,他的史学研究虽然在台湾早有介绍与批评,可大陆学者(除少数以外)对他的了解则主要是最近几年的事。近年来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回忆录和遗著中国新史等已陆续被译成中文,柯文(Paul Cohen)对费氏学派的评论和伊文思关于他的传记以及生前友人和弟子对他的回忆等也已有了中文版。”我国学者杨连仲在《费正清的思考》一文中也介绍说:

费正清是一位早年多方面地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积极传播者,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及其思想认识上,他力求跨越时间与文化两大鸿沟,使所研究与介绍的中国历史、国情、民俗等,富有新意。他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表现出了一位外国学者的深邃目光。如美国应当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应当默许其他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通过迂回的道路改善对华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主张美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采取现实态度,给予承认,放弃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一切都说明,他为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费正清是受韦伯斯特(Charles Kingsley Webster,1886—1961)的启发和莫斯(Hosea Blallou Morse,1855—1934)的指导而与中国史结缘的。费正清的成名又与中国学者如蒋廷黻、邓嗣禹等人分不开。费氏一生中有许多杰出的中国学生,他也比较热衷于与中国去美国的学者合作。八九十年代,国内翻译剑桥中国史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目前已出版崔瑞德、鲁维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崔瑞德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美国牟复礼、英国崔瑞德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傅海波、崔瑞德编的《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等。至于费正清的著作,已翻译出版的有《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伟大的中国革命(1900—1985)》(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另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刘尊棋译的2000年版)、《中国:传统与变革》(与赖肖尔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费正清自传》(黎明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篇·第一章 通史、断代史、历史考证

1993),另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陆惠勤等译本《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美国与中国》被誉为费氏中国史三大名著之一。钱金保介绍说:

费正清写《美国与中国》是为了从跨学科角度向美国大众通俗易懂地介绍数千年中国史。虽版本有异,但全书框架基本保持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以前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分析西方入侵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社会革命;第三部分则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现状。该书在历次再版时均经修定扩充,观点在不同版本中也有微妙变化。不过,在初版时形成的基本思想在以后的版本中还是有连贯性的。……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力图解释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和西方入侵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并探讨这种变化与国内外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传统和环境,中国革命和国共之争直接源于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他立论的两大基本概念是“集权传统”和“社会革命”,其分析方法便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集权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结构的反映和正统哲学妨碍了科学方法的发展,也导致了政治生活中的惰性。汉——异族共治则起了同化异族征服者的强化儒家传统的作用。集权主义渗透到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诸多方面。这种处于动态稳定中的传统秩序在西方的冲击下逐步解体。中国的朝代循环过程因此注入了来自西方的力量。通商口岸制取代了朝贡制度。对费正清来说,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是19世纪中期,传统与现代的分界就在于此。而中国近代史的过程就是一场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社会革命。他的社会革命的外延很广,包罗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洋务维新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国共两党的兴起与斗争等内容。他所理解的中国近代化并非等同于西方化,中国长期的集权传统就不会接受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主义。他的结论就是:中国在4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并非选择美国式的个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或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真正的选择是旧的国民党专政还是新的共产党专政;但国共之争应由中国人民自己去选择而不应该由美国来决定。(《中国史学大师费正清》)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自从明治时代创立近代科学的“东洋史学”以来,经过百余年间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积累,成就显赫。其研究水平,就总体而言,越过欧美,在许多领域中还与我国并驾齐驱,而且在某些我们未遑顾及的领域则独占鳌头,居于世界前列。有鉴于此,为了借他山之石,北京大学刘俊文先生在90年代初主编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书,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选收日本明治以来近百位第一流学者及有成就专家的150余篇优秀论文,译成汉语,汇为10集。其中第1卷为通论;第2卷为专论,主要收译有关中国史的理论性研究论文;第3卷为上古秦汉;第4卷为六朝隋唐;第5卷为五代宋元;第6卷为明清;第7卷为思想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第四卷

宗教;第8卷为法制;第9卷为民族交通;第10卷为科学技术。全书总计300余万字。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展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主要成果,为了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提供实际材料和准确线索。刘俊文说,为了保证该书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在选编过程中紧密依靠日本东洋史学界,采取“从日本学者中来,到日本学者中去”的工作方法。入选学者的标准是:一、一流水准,二、广泛影响,三、代表各个不同学派和学术风格。入选论文的标准是:一、反映学者的最高研究水平,二、已经发表并产生过较大影响,三、尚未译成中文。遴选原则是:一、详生略死,二、详近略远,三、多少不等。具体选哪些学者和哪些论文,则由日本东洋史学界提出并议定,参与评议的达120余人。周一良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的特征有六:

一、遵守乾嘉朴学大师的领导,读书必先识字;

二、注重穷尽资料,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

三、注重结合书本记载进行实地调查;

四、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思想、宗教、法制、科技、中外关系、历史、地理多方面;

五、就时代而言,几乎从远古到近代、现代各时期都有人钻研;

六、研究成果有足够的发表园地。

上述主要特征,都能体现在10本选集中。

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学家骆惠敏编的《莫里循文书集》,这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与近代中国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外国私人档案资料集。莫里循自1887年起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辛亥革命后作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顾问,在中国活动了20年。他富有政治头脑,忠于英帝国主义利益,又善于刺取情报,活动能力很强,这就使得他的往来函电和各种备忘录内容丰富,对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很有帮助。黎澍在《读〈莫里循文书集〉》一文中指出:该书中“有若干关于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反袁斗争的很足以说明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如1911年11月蔡廷干去武昌和革命党代表谈判归来向莫里循介绍谈判情况的记录;同年11月7日严复阐述他对武昌起义和中国前途的看法的长信;1915年4月孔祥熙报告孙中山流亡日本的情况,并建议袁世凯召回孙中山以瓦解革命党的密信和备忘录;1916年6月1日蔡廷干叙述他当天和已经病危的袁世凯对话的信件以及记述端纳等人策动李纯武统一全国的材料,等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此外,本书还提供很多有关国际关系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了解当时列强侵华的形势和中国所处国际环境也很有意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译处曾经收集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发表的论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论文和有关资料,编译成《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到1996年6月已推出了第2集。

此外,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蒙古学专家H·鲍培的学术名著《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书,有了西北民族学院郝苏民先生的中文译补本,书后附有全碑铭词汇、有关八思巴的史料、H·鲍培的书目等。自元以后,在我国各地及海外和中亚都发掘出大量八思巴文的碑铭、牌符、文书残片,成为蒙、元史、文物考古和文字语言学、宗教史各学

科研究的珍贵文献。苏联科学院院士 H·鲍培对之进行系统研究和整理,形成了力作《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国际上有俄、蒙、日、英文版本。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第四卷

第 2 章

中外关系

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考入中国海关。1876年,任厦门海关帮办。1878—1886年,在上海造册处任职。以后历任九龙、淡水、镇江、宜昌、重庆等地副税司、代理税务司和税务司等职。1897年,辞职回国,从事汉学研究和著述,他所著的《大秦全录》(1885。或译《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是一部关于中西交通史的名著。此书自成一家之言,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有一定的说服力。《大秦全录》出版至今,虽逾百年,但过去和现在的国外汉学家和国内研究中西交通的史学工作者,无论反对或支持他的,都往往引用其论述。所以,此书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朱杰勤将此书译成中文,共11万余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按原书目录分为自序、导言、史料、考证4个部分。

关于中外关系的著作,除此以外,国内翻译出版的,20世纪20年代,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怀德著的《中国外交关系史略》(王莪荪译,1928),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桑原鹭藏著的《蒲寿庚考》(陈裕菁译,1929)。早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曾出过桑原此作的另一译本,改名为《唐宋元时中西交通史》(冯攸译)。桑原鹭藏(1870—1931)与那珂通世(1881—1908)、白鸟库吉(1865—1942)并称日本东洋史三大师,曾任东京高师教师约10年,京都帝大教授21年,主持该大学设立的“东洋史学第二讲座”。他所著的《蒲寿庚考》最脍炙人口,曾受帝室奖金。该书以宋末泉州阿拉伯蒲寿庚为中心,论述当时南海贸易交通。蒲寿庚在泉州拥有大量海船,为沿海地方势力首领,宋末任提举市舶30年。元兵南下时投降,至元十五年(1276年)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尚书左丞,招东南亚各国商人,恢复沿海贸易。中华书局还于1929年出版过德国外交部编的《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王光祈译)一书。

30年代,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桑原鹭藏著的《中国阿拉伯交通史》(冯攸译,1934)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1935),藤田丰八著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1936),关卫、熊得山译的《西方美术东渐史》(1936)和法国伯希和著的《交广印度西道考》(冯承钧译,1933;中华书局,1955);有中华书局出版的W·William著的《中西文化交通史译萃》(朱杰勤译,1939);有国际问题研究会翻译出版的美